

从先秦到明清，我们的祖先一直在苦苦追寻 秦始皇求仙问药的“昆仑”究竟在哪里？

□王凯迪

茫茫山海： 昆仑之墟何在？

关于昆仑的记载，最早起于先秦时代的典籍中，最初多被称为“昆仑之丘”或“昆仑之虚（墟）”，代指一片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神秘领域，不仅有高耸入云、连绵巍峨的山群，更是有神兽守卫的“帝之下都”（天神在人间的都邑）。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往……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尔雅》载：“河出昆仑虚，色白”“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

早期昆仑的方位十分模糊，其有效的地理标识仅有“西北”“西次三经（山海经中西方山脉的第三序列）”，而能够产出“璆琳琅玕”这样的精美玉石，根据《山海经》其他已知山系的推测（如西山经中为首的是陕西华山），只能推断出昆仑位于从关中平原向西北，包括甘肃、青海与新疆等地在内的广大群山之中，但有关真正的昆仑在何处，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方位记载。从此时开始，昆仑与黄河（古称“河水”）源头所在已被深度绑定，从而使后人总将探求“昆仑”与追寻“河源”两大地理使命合二为一。

昆仑之墟的神秘玄幻不仅牵动着历代探险家的探奇之心，更让古往今来的中原帝王心怀向往。据《穆天子传》记述，最早向西抵达昆仑之境的是周穆王，他在西征巡游时得河伯指引，到达从关中宗周西行8100里的昆仑。甚至有言，周穆王曾在昆仑山周边的瑶池与西王母相会结下不解之缘。此次周穆王在昆仑山上对黄帝之宫的参拜尽管存在争议，但先秦时期古代中原对于昆仑之域的内心崇拜显然已经贯穿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之中，并为天子诸侯所共知。

乾坤大挪移： 昆仑空间的斗转星移

秦汉时期，随着“华夏文化圈”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古人开始尝试拨开昆仑这一“上古神山”的神秘面纱，在不断拓展的边疆中追寻它的准确位置。

向西方探寻昆仑所在的契机来自秦国的西向扩张。战国末年，秦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秦人）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秦国三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原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深入到黄河上游的宁夏甘肃一线，从而将《山海经》中渺茫的西土逐渐具象化。

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华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横空出世。与辉煌一统相伴的是秦始皇本人对大秦帝国的独特构想。首先，信奉传统秦国神祇的秦始皇

前段时间，《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在中国的历史与考古学界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一大批历史学者纷纷就这一石刻的篆刻字体、年代、文字内容以及当地自然环境发表了相关评论。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发布会，宣布“经审慎研究，认定该石刻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众说纷纭中，大家最为关注的莫过于石刻对“昆仑”这一中国古代传奇圣山的地理定位，从先秦到明清，昆仑都堪称“神圣之巅”，它的存在曾被认为是传说中虚幻之处，也曾在从陕西到新疆之间的山川广域之中辗转腾挪。那么中国古代的“昆仑”究竟在何方？



昆仑山脉景色美如画。

想要通过“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的方式将整个东方六国的信仰体系融为一体，因而在统一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天下祭祀巡行，其中第一次巡行路线便是：“（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秦始皇将西方疆域山川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也为当时官方与民间继续向西探求昆仑山川奠定了基础。而秦始皇个人对于长生不老的不懈追求，也为当时官方民间以寻仙问药为由的四方探寻提供了契机，所谓五大夫翳“采药昆仑”石刻上的这段史书上并未记载的神奇故事，或许正是在这一实地考察的背景下产生。

实际文献中对于昆仑的第一次官方认定出现在汉代。《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这里穷“（黄）河源”的汉使便是张骞及其副使，他在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断定黄河的起源在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的山中，认为发源于于阗山中的河水向东汇入盐泽（也称蒲昌海，位于今天的新疆罗布泊）后就变成了潜行地下的隐河，随后在南方涌出地面变成黄河的源头。在获得这些关键信息之后，汉武帝依据玉石对比古图书，最终判定于阗的南山（今昆仑山西段一部）为昆仑山。

魏晋以后，河西走廊一带在中原战乱背景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黄河上游地区相继出现了“五凉”政权，对黄河上游与祁连山以南的高原地区认识更为清晰。《晋书·张骏传》载：“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缕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这里认为的昆仑山在祁连山之中，

将昆仑对中原的距离重新拉近到华夏的边缘地带。唐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著作《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同样延续了《晋书》的看法。

在北方政权企图将昆仑山拉近的同时，佛教文化的传入则为昆仑山的位置增加了一条新的赛道。来自中亚西域的僧人力图将佛教与华夏文化融会贯通。前秦高僧释道安，为了更好地将佛教传播给广大中原之人，将印度传说中佛教圣地阿耨（nòu）达山（佛教文献中为印度河与恒河等四大河的发源地）附加了浓郁的中华神话色彩。《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在引据道安《释氏西域记》的“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时解释说：“山即昆仑山也。”再如引《穆天子传》中“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官”时解释：“黄帝官，即阿耨达官也。”郦道元对这一说法的认同展现出当时中原社会浓厚的佛教氛围以及西来佛教与华夏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昆仑”一度同时成为佛教与中国原始道教的圣山福地。根据后世地理著作考证，阿耨达山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青藏高原西部的冈底斯山。

观览河源昆仑： 大一统帝国的不懈追求

繁盛的唐代为昆仑的进一步具象化提供了契机。

贞观九年（635年），唐朝对盘踞在今天青海北部的吐谷浑发起总攻，唐军从鄯州（今青海西宁）出现，分南北两道一路西进，从青海湖一线向黄河上游以轻骑快速深入，创造了中原王朝在青藏高原作战的空前胜利。史载唐朝北路大军从青海湖向西贯穿格尔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进入新疆南部。南路大军在侯君集率领下从青海湖溯黄河源头而上，途经两

本固定在黄河西南方向的青海一带。

13世纪下半叶，忽必烈建立大元，青藏高原第一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统辖吐蕃地区（今西藏及青海大部）军政事务的机构——宣政院。庞大的疆域和通畅的道路为内地人员对青藏高原进行全方位考察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忽必烈为了建立汉唐都未能达到的功勋，彰显大元对寰宇一统的历史功绩，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也有说法为十七年（1280年），派遣女真人都实从甘肃临夏出发穷探黄河之源头，完成“古无有也”的历史创举。

都实首先在唐人的基础上确认了星宿川为黄河源头所在，即将近黄河上游星宿海星罗棋布的泉流地带清晰描述为黄河源头。随后又记载：“朵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又言黄河先自西向东绕昆仑之南行，随后“河水北行，转西流，过昆仑北”。

由此可见，元代定义的昆仑并不在黄河源头处，反而是黄河上游一串被黄河绵延环绕的巨大山脉，以今天的地图观之，恰好是三面为黄河所环绕的今阿尼玛卿山山脉，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被称为“大积石山”，与《尚书·禹贡》中“导河积石”的记载不谋而合，此处昆仑山的译音“腾乞里塔”很可能也与蒙古语中的腾格里词汇同源，有所谓“天山”之义，即当地人目中的“神山”。

古人对昆仑最为系统性的考察还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清廷全力平定西北新疆一带的准噶尔部落，当时的青海处于准噶尔、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要冲，位于青海境内的和硕特蒙古部落便被视为朝廷重点争取对象。康熙帝借探查河源的机会在当地宣扬朝廷恩威，作为勘察使者的侍卫拉锡与舒兰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不辱使命再次来到“星宿海”，得知其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认为“即昆仑也”，同时认为从周边“库尔滚”群山中涌出的三条河流（包括黄河上的卡日曲与约古宗列曲）即黄河源头所在，这一发现再次佐证了《山海经》中“河出昆仑”的基本猜想，而此处的库尔滚（坤）山，即今巴颜喀拉山，这一结果也基本与今日现代地理考察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

现代地理学上的昆仑山脉从帕米尔高原发端，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一路向东，在进入青海之后，则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向东南延伸，形成巴颜喀拉山脉与阿尼玛卿山等多列山系，而古人对于昆仑位置的探究尽管不尽相同，但终究处在“大昆仑”的范畴之中。

大秦将昆仑视作求仙访药的神仙居所，汉武帝将昆仑视为汉家西域的明证，昆仑在大唐与吐蕃的交往中撤下隐藏的迷雾，在元代丈量寰宇的脚步中逐渐明晰，最终在清代的一统功业中找到了真实而确切的归宿。

据“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